



ཐུ་བོད་བརྒྱུད་ནང་བསྟན་གྱི་མངོས་ཚལ་ཞིབ་འཇུག

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第三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谢继胜 罗文华 景安宁 主编

2007' 第三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谢继胜 罗文华 景安宁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第三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
讨论会论文集/谢继胜,罗文华,景安宁编.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 - 7 - 5325 - 5158 - 3

I. 汉... II. ①谢... ②罗... ③景... III. 佛教 - 宗教艺术
- 中国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J1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7216 号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资助

汉藏佛教美术研究

——第三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谢继胜 罗文华 景安宁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7.5 插页 2 字数 900,000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2,300

ISBN 978—7—5325—5158—3

K · 1242 定价:12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	霍 巍 1
解读《巴协》中“藏式佛像”之说·····	白日·洛桑扎西 15
Cave Temples in Dunhuang & the Period of Tibetan Rule (781—847): the Vimalakirti Debate, the Mahaparinirvana of the Buddha ·····	Heather Stoddard 23
敦煌石窟历史的重构——敦煌吐蕃期洞窟诸现象之省思·····	沙武田 47
被遗忘的曼陀罗:唐代初传的金刚界曼陀罗·····	赖依缙 79
敦煌藏经洞出土五代绢画降魔图像解读·····	李静杰 87
西夏石窟壁画中水月观音的传承与流变·····	王艳云 107
伏虎罗汉、行脚僧、宝胜如来与达摩多罗——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 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个案分析·····	谢继胜 113
Styles in Western Himalayan Art·····	Christian Luczanits 133
拉萨药王山南崖牛头造像考·····	张骏逸 151
Hevajra and Mahākāla: A Pair of Tantric Gilt Bronze Buddhist Images from Gansu Province·····	Roderick Whitfield 165
Dating the <i>kesi</i> -Thangka of Acala in the Tibet Museum, Lhasa ·····	Bernadette Broeskamp 185
Is There Any “Anige Style” in Nepalo-Tibetan and Tibeto-Chinese Metal Sculpture of the Sa skya Yuan Period?·····	Michael Henss 199
Chinese Influence in Some Wall Paintings at Zhwa lu and Their Political Meaning within Their Cultural Context·····	Erberto Lo Bue 213
兴化寺壁画与晋南元代寺观壁画群的几个问题·····	孟嗣徽 223
一幅巨作,几点猜测——关于元代刻丝大威德金刚曼荼罗·····	尚 刚 261

从胜利幢到雨伞——谈元代居庸关过街塔基门券两壁之 四天王造形	林春美	269
Sino-Tibetan Influence on Goryeo Buddhist Art in Korea	Lena Kim	281
A Yung lo Embroidery Thangka: Iconographic and Historic Analysis	Amy Heller	293
A Tibetan Thangka Painted in Beijing	Helmut F. Neumann, Heidi A. Neumann	303
Sino-Tibetan Tangkas of the Chinghua and Zhengde Periods in Western Collections	Marsha Weidner	311
A Version of the Ngor Mandala Collection	Musashi Tachikawa	333
略论明清唐卡绘画中的玻璃器皿	林 姝	339
试考雪堆白及其造像艺术	吉如·巴桑罗布	363
四川白垭寺藏传佛教壁画调查报告——壁画的内容与时代	罗文华	369
藏文题记观世音铜像考——兼论却英多吉题记造像的制作年代	胡国强	389
Sitatapatra (Baisangai fomu; gDugs dkar po):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 Buddhism	Françoise Wang-Toutain	397
清宫大白伞盖佛母信仰探析	马云华	421
The Qianlong Emperor's Crypt: Tibetan-Buddhist and Sino-Manchu Representations in the Mingtang Section	Alan Richard Sweeten	433
Qing Buddhist Architecture between Beijing, Inner Mongolia and Amdo: <i>The Huilang Shi Dugang</i>	Isabelle Charleux	459
The Iconography of the Sixteen Karmapas of Tibet. Karmapa-Representations in Tibet and the West — 13th-21st Century	Elisabeth Haderer	481
夏吾才让、张大千和汉藏文化交流, 1941—1943: 界定中古和现代安 多地区画坊生产的研究方法	胡素馨	485
佛装与僧装的概念以及穿着形式	陈悦新	499
“定光佛授记”与定光佛	耿 剑	511
西藏曼荼罗缘起	景安宁	521
大黑天图像样式考	李 翎	529
佛教美术上的仁兽	金 申	539
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Style in Studies of Tibetan and Sino-Tibetan Art	Chandra L. Reedy	545
Regional Styles in Tibetan Furniture	Christopher D. Buckley	565
纳西族东巴教“神路图”与藏传佛教“生死之轮”比较研究	木仕华	573



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系)

吐蕃王朝(七—九世纪)兴起和建立于青藏高原,历史上曾是一个称雄于亚洲腹地的强大帝国,其势力最为扩张之时,一度东抵大唐之西境,西与阿拉伯大食相抗衡,南侵北印度中天竺,北控西域“丝绸之路”及唐之四镇。吐蕃时期,由于其与外部世界发生过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元性。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大量出土吐蕃文物越来越展示出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成为研究吐蕃史和中国边疆史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对笔者所调查的一批流散于海外的吐蕃文物略作观察与初步分析,为学术界将来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一、调查研究缘起

吐蕃文物与其他西藏文物一样,历来是国际收藏界的热点之一。但是,与我国西域地区不同之处在于,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宗教环境,过去外国势力很难进入到这一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所以获取的地下文物很少,远远不及西方学者如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我国西域地区的“收获”。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青藏高原地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自身的考古工作起步也相对较晚,所以地下出土文物的数量也很少。过去虽然有外国学者曾经以各种身份进入到这一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非法发掘,但工作十分零散,并且多限于地表的调查和采集,所获取的地下实物资料极为有限。^[1]真正属于吐蕃时期的文物除在地面保存有一些碑铭、铜钟、石雕艺术品之外,过去也大多埋藏于地下未见天日。

但是,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边疆考古工作的开展,情况也在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在青藏高原地区陆续有吐蕃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引起了国内外注意。^[2]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出土吐蕃文物通过不同途径流散到海外。为了及时总结近十年来青藏高原吐蕃考古工作新的发现资料与新的研究进展,2005年,笔者申请并获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近十年青藏高原吐蕃考古材料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850004)及四川大学985二期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研究成果之一,并获美国ACC项目资助。

[1]有关西藏地区考古的情况可参见霍巍《西藏考古工作的问题与展望》,《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二十世纪西藏考古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1年第6期。

[2]霍巍《近十年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究基地重大项目“近十年青藏高原吐蕃考古材料综合研究”，开始对近十年来吐蕃考古资料进行系统收集与整理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关于流散于海外吐蕃文物的信息与线索，但一直无缘得以目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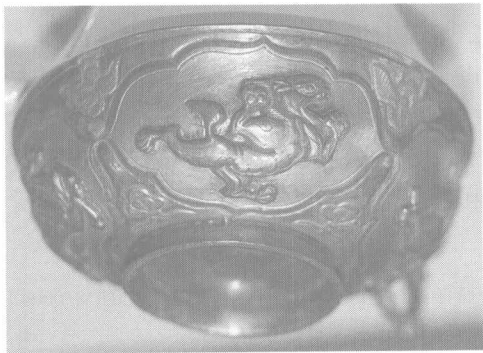
2006年，笔者有幸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项目资助，从而得以组成调查小组前往美国各地寻访调查有关吐蕃文物流传海外的情况，在多方支持协助之下，我们先后调查访问了美国的十多座博物馆与一些私人收藏家，取得了若干重要的收获。本文所介绍的这批吐蕃文物，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

二、吐蕃文物的调查与观察

本文所涉及的调查对象包括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芝加哥大学Regenstein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物馆(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华盛顿特区国立佛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华盛顿特区沙可乐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纽约罗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纽约喜马拉雅艺术研究所(Himalayan Art Resources)、纽约“西藏之家”(Tibet House)、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洛杉矶县立博物馆及一些私人收藏家。从总体情况来看，上述各博物馆、研究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有关我国西藏地区的文物主要以藏传佛教美术品(唐卡、金属造像、泥塑等)为其大宗(笔者将另文加以介绍)，其次为近现代西藏民族与民俗用品，真正属于吐蕃时期的文物相对上述两类文物而言为数很少，但当中不乏一些在国内罕见的精品。兹择要介绍如下：

(一) 金银器

银带把杯一件(照相号为80A-20)：高4.5 cm，口径11.6 cm，私人收藏品。杯体呈圆钵形，鎏金，器体无棱，敞口，带有矮圈足。杯内壁上为阴线刻的四组鸟纹，每只鸟都朝向一个方向，足踩在缠枝花上，杯底部为三条同向相环绕的鱼，错以金色。杯体外为四组带翼神兽，可辨识其可能为狮、羊形象各二，其中奔狮前肢高抬，用后肢奔跑，具有拟人化的表现，奔羊头上长有角，下颌生出胡须，狮与羊的肩部均用阴线刻出短翼，故可视其为带翼神兽。另在杯的指垫上也有一浮雕的奔兽，似为狮子。在杯体四翼兽之间用三组鸟纹、四枝莲花加以间隔【图1】。



【图1】 银带把杯(照相号80A-20)：高4.5 cm，口径11.6 cm，私人收藏家收藏。

银瓶一件(照相号为80A-28)：高18.5 cm、底径6 cm、口径7 cm，私人收藏品。瓶体修长，喇叭口，细长颈，圆肩，长鼓腹，喇叭形圈足。银瓶纹饰可分为上下两组：上组花纹在瓶颈部的下方，其上以一周莲花纹样与瓶颈部相间隔，纹饰为三组两两交颈站立的鸟类动物共六只，其中一组头上有冠，一组头上有角，一组口中吐出长舌，各组之间有花草纹样相间隔。下组纹饰在器物腹部，其上、下均有花草纹样相间，当中有三只有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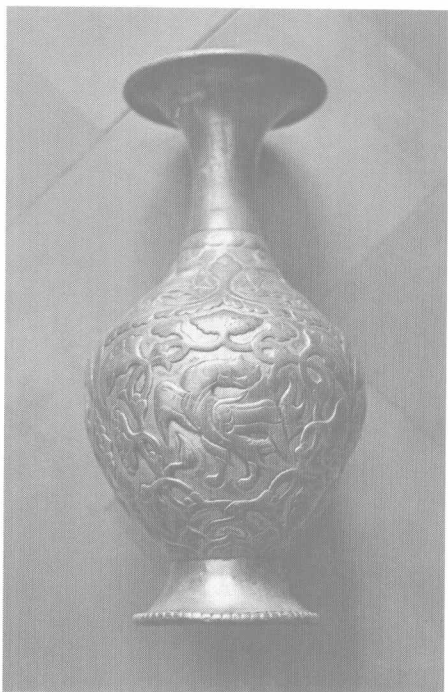


神兽，站立于花草之间，神兽造型均为兽首或鸟首禽身。在瓶底篆刻有藏文一行【图2】【图3】。

银质马鞍及马饰一套(照相号为80D-27):私人收藏品。马鞍分为坐垫与障泥(鞞)两部分。坐垫为木质,上髹黑漆,在其前、后鞍桥上外包以镀金银饰片,前鞍桥档宽30 cm、高25 cm,后鞍桥档宽45 cm、高12.5 cm。障泥部分宽49 cm、长70 cm。在前后鞍桥的金银包片上压印有带翼狮、马的动物纹样和花瓣纹,每朵花瓣采用了镶嵌宝石的工艺技术,在花朵中心镶嵌一颗蓝宝石,每瓣花叶均镶嵌绿松石,这些宝石现大部虽已脱落,但仍有部分得以保留,饰片在动物和花瓣纹样的上方还压印有卷云纹,下方有象征植物的叶片纹,整套马鞍显得极为富丽堂皇【图4】。

与此件马鞍配套的还有一套基本完整的鎏金铜马饰件,初步观察分析大体有辮头、胸带和鞞带上的装饰,其中尤其以鞞带横带上的垂饰——“杏叶”十分精美【图5】,在整套马具中只是未见到马镫。此外,在马鞍上还均覆盖有保存完好的织物,上面有对狮、对鸟等图案(详见下文丝织品部分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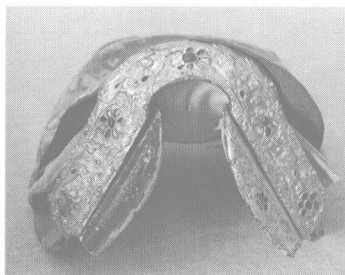
银瓶一件(编号1988.67.1):高23 cm、底径6.5 cm、口径8 cm,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侈口、细长颈、鼓腹、喇叭形圈足,圈足下缘饰联珠纹。银瓶上部饰有四鸟纹,器腹有一方印,上饰有一蹲伏动物,似为狮子,腹部共有四组图案,似为一入面鸟身人像、一狮、二龙,其中一龙似为二龙交尾形状。动物周边饰以缠枝葡萄纹。其中的人面鸟身像头上戴有三花冠,身穿有交领长袍,身体两侧生有羽翼。此器的英文说明标签中有如下记载:“Tibet made for Chinese wife of Emperor Songtesn. G: ‘Vase’ mid boos (Silver with gilding).”此器并无藏文题铭,笔者推测其应与下述银带把杯(编号为1988.67.2)同出,而银带把杯底部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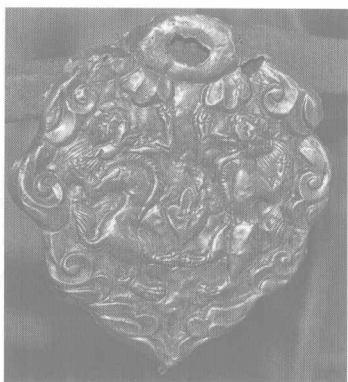
【图2】银瓶(照相号80A-28):高18.5 cm、底径6 cm、口径7 cm,芝加哥私人收藏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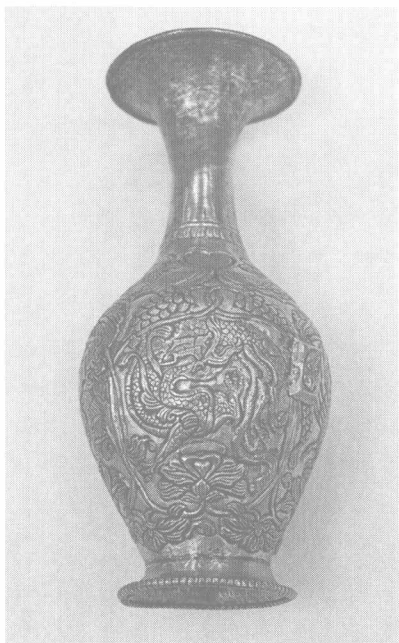
【图3】同图2,芝加哥私人收藏银瓶底部的藏文题铭。



【图4】银质马鞍及马饰一套(照相号80D-27):私人收藏家收藏。前鞍桥档宽30 cm、高25 cm,后鞍桥档宽45 cm、高12.5 cm。障泥鞍部分宽49 cm、长70 cm。



【图5】银质马鞍鞞带横带上的鎏金垂饰——“杏叶”。



【图6】 银瓶(编号1988.67.1):高23 cm、底径6.5 cm、口径8 cm,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图7】 银带把杯(编号1988.67.2):高9.8 cm、底径10 cm、口径12 cm,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的藏文铭刻内容与其所属有关(详后文)从而作出的推定【图6】。

银带把杯一件(编号为1988.67.2):高9.8 cm、底径10 cm、口径12 cm,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杯体呈直筒状圆形,无折棱,带有两个上下重叠的指环,指环上部有一横平状的指垫,器底与口部直径相当。口部以下饰有联珠纹样一周,器腹部通体饰有缠枝莲花纹样,图案之间为三组缠枝莲花纹样相间隔,当中有三立兽图案,器腹部由三组缠枝莲纹构成环状,环状花纹中间各有一兽。一兽头生两角,另两兽均头上无角,均呈站立姿势,具有拟人化的特点,当系某种异兽的形象。此器底部有篆刻的藏文一行,内容详后【图7】。

银来通一件(编号为CMA88.69)。此器长30 cm、口径最大处为9.1 cm,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此器整体呈角状,口沿处饰有一周联珠纹,其下方以一周忍冬纹样为底纹,整体饰有缠枝花草纹样。器体上部饰有三组纹样,其一为戴冠的人首鸟身形象,身带双翼,冠为三花冠,其形象与上述银瓶上的人面鸟身像十分相似;另一为一凤鸟;另一为一呈鸟身狮首的异兽形象。器体下部为二立狮像,来通的嘴部呈鹿头状,从鹿口中伸出一短管【图8】【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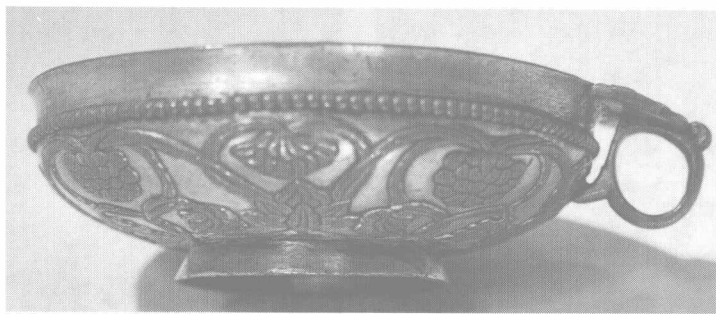
银带把杯一件(编号不详),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杯体较低平,口部略向外敞,器腹下部内收。口沿上部饰有一周联珠纹,器腹部饰有六组缠枝葡萄纹,器底带有矮圈足【图10】。此器现正展出于大都会博物馆,其展品说明文字称其出土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中国西北,时代为吐蕃时期(八世纪)。



【图8】 银来通(编号CMA88.69)。此器长30 cm、口径最大处为9.1 cm,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图9】 银来通上的人首鸟身图案。



【图10】 银带把杯(编号不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金高脚杯一件(编号不详),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器侈口,深腹,高足,高足的中腰有算珠状结。杯体由内外两层构成。杯体外侧口沿饰一周细小的联珠纹,近口沿处有一周长方形分格,格内动物从右至左为猪、兔、牛、虎,应有12格,饰十二生肖。腹部由缠枝蔓草相互勾连形成上下两层8个桃形框,每框中有一翼兽,两两相对。圈足下部呈喇叭状,饰有4个兽纹,圈足底外缘饰联珠纹【图11】。此器现正展出于大都会博物馆,其展品说明文字称其出土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代为吐蕃时期(七—八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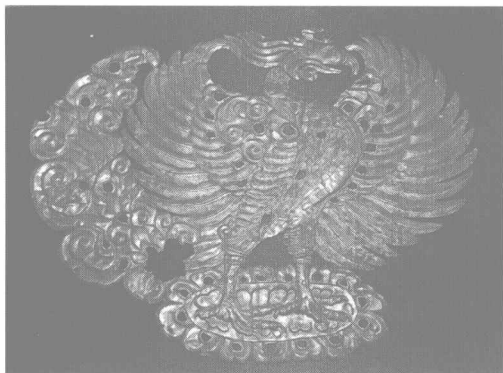
【图11】 金高脚杯(编号不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此外,据笔者实地调查所见,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文物库房内收藏的可能属于吐蕃时期的金银器还有以下几批:其一为亚洲部李丹丽博士见示的由该部门于近年来收藏的鎏金银护臂装饰片,其上饰有四组动物图案,上、下各两组,与这件鎏金银饰片同出的还有一批花朵状饰物和一批小兽形象的饰物,有可能系腰带(宝带)上的饰物或马饰;其二为由纽约一私人收藏家所收、现正交由大都会博物馆武器部鉴定的一批鎏金银质马鞍饰件,饰件上用阴线篆刻有两个骑马射猎人物形象,其中一人头戴有三花冠,身挂剑袋,另一人回首引弓作骑射状,身穿长袍,其服饰特点与克里弗兰博物馆所收银器来通上所出现的人物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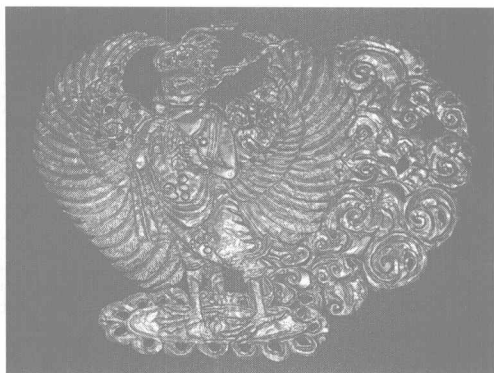
(二) 金属饰件

在这批流传海外的吐蕃文物中,还有一批用途不明的金属饰片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饰片多系鎏金银饰片,上面以捶拓、压印、篆刻等不同方法得到忍冬、莲花、团花、缠枝花草等纹样。其中尤其以一组鎏金银饰的伽陵频伽鸟与凤鸟组合饰片最为精美,这组饰片现为一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照相号为DWG80),共有十四片,其中半数为凤鸟形象,凤鸟头部高昂,两翼大展,双脚站立于一椭圆形的莲形小毯上。另有半数饰片与凤鸟饰片质地、大小、制作工艺等均基本相同,但造型为人首鸟身的伽陵频伽鸟,头部均戴有不同式样的花冠,双翼外展并向上扬起,两手各执有横笛、笙、鼓、箜篌等乐器正在演奏,两脚站立于一椭圆形的莲形小毯之上。这两类饰片上面均遗有多个有规律的小孔,显然可供钉缀之用,说明其可能为某种装饰在壁面上的饰物【图12】【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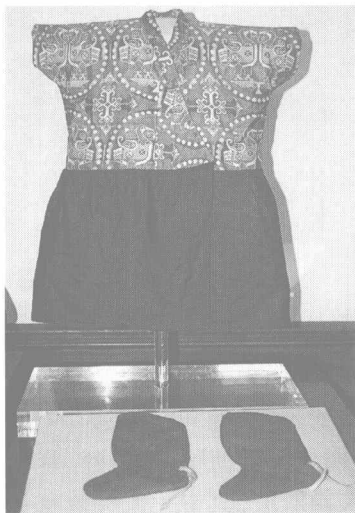


【图12】 鎏金银凤鸟纹饰片，私人收藏家收藏（照相号DWG80-1）。



【图13】 鎏金银伽陵频伽鸟饰片，私人收藏家收藏（照相号DWG80-2）。

（三）纺织品



【图14】 联珠对鸟含绶纹小孩裙衣及套筒，私人收藏品（照相号80B-26A）。衣长50.5 cm、下摆宽42 cm，两袖之间宽40.5 cm。



【图15】 联珠对鸟含绶纹小孩衣物，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除上述金属器之外，这批吐蕃文物中还发现有几件保存状况完好的纺织品衣物，这在国内目前所发现的吐蕃时期纺织品中是极其罕见的珍品，兹列举数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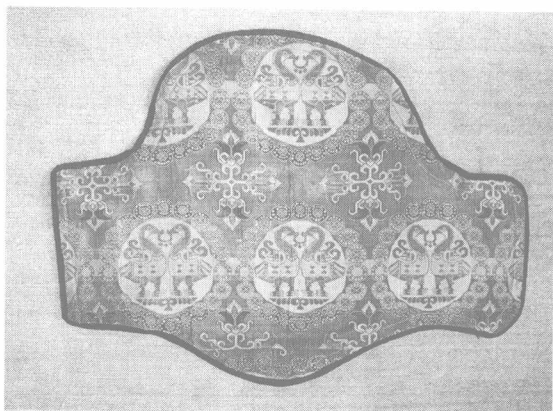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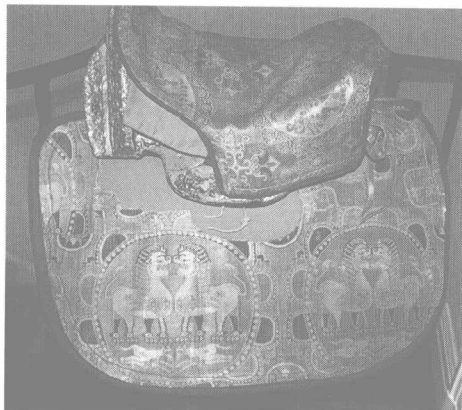
小孩裙衣一件，私人收藏品（照相号为80B-26A）。衣长50.5 cm、下摆宽42 cm，两袖之间宽40.5 cm。这是一件上衣下裙式样的对襟短袖衫，衣服上衣为一带有直领式衣领的左衽小衫，系采用质地较为厚重的织锦制成，衣服的衬里为绛红色丝绸，织锦上有精美的联珠纹大团窠对鸟纹饰，下裙为素面青色织物。与上述衣物同出的还有一双小孩的套筒，为私人收藏品（照相号为80B-26C），系绛红色丝织品制成，套筒上用暗花饰有联珠团窠团花纹、缠枝花鸟纹及人物纹样等【图14】。

小孩衣物一件，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此件衣物系该馆于1996年购入，是一件对襟小衫，衣领为直领式的长领，长袖，左衽，前襟共有三片相接而成，其衣物的质地、纹饰等与上述照相号为80B-26A的私人收藏品极为相似【图15】。此前曾有学者对此件藏品作过介绍，^{〔3〕}此次调查中笔者得以亲眼目验。

马鞍织物一件，私人收藏品（照相号80D-27）。与上述金属马鞍相配而出，其中马鞍坐垫织物宽66 cm、高52 cm；障泥（也可称为鞞）部分织物宽49 cm、长70 cm。坐垫织物纹饰每一单元图案均由花朵组成的联珠纹样作为团窠花环，联珠纹的每一个珠子又都是一朵花朵，团窠的中央为含绶带的对鸟纹，所含绶带中央下垂有三颗宝石，鸟身颈部饰

〔3〕 James C. Y. Watt & Anne 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p.34-35.





【图16】、【图17】 马鞍织物，私人收藏家收藏（照相号80D-27）。与金属马鞍相配而出，其中马鞍坐垫织物宽66cm、高52cm；障泥织物宽49、宽70cm。

有联珠条纹，尾部分开有向上翘起的羽毛，双脚站立于棕榈座上，周边的宾花为对称的四蒂十字形花。障泥织物的纹样外周为一花瓣组成的团窠，中央为带翼的对狮图案，狮子鬃毛直竖，胸部饰有联珠纹样，尾巴上翘，双脚下有一对驴纹。宾花为一小团窠纹【图16】【图17】。

三、几个相关问题的初步认识

由于上述调查中这批流散于海外的文物资料大多没有标明其来源及其获取途径，缺乏考古学背景，所以对其年代、出土地点、器物风格特征等诸多问题的判定都带来相当的难度，必须广泛结合既往出土发现的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对比，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认识，应当说笔者对这批资料的观察和研究才刚刚开始，许多问题都还仍然在思考探索当中，尤其是细致的器物类型学对比还需要花费相当时间。这里仅能就其中一些问题先提出一点粗浅的个人意见供学术界讨论批评。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廓清一个基本概念，即本文所称的“吐蕃文物”，是指从吐蕃统治区域内或吐蕃系统（包括被吐蕃兼并的吐谷浑、苏毗、羊同等各部族在内）墓葬内出土的文物而言，并非是指狭义的由吐蕃制作的文物。其中既有可能包括吐蕃自身制作者，也有可能包含从中原或其他国家或地区传入者。

（一）独具风格的金银器工艺

首先，这批文物当中的金银器从总体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风格特点。如当中的鎏金银带指杯、银瓶、银来通以及高脚金杯等器形，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上都具有唐、波斯萨珊、粟特等金银器的特点，这几类器物可以肯定其母型均不是起源于中国，而很可能是来自西方的工匠直接制作于境外或者在中土仿制而成，但至于其究竟属于哪一种风格样式，还需要作深入细致的比较。

以其中的带指杯为例，这批文物中共有鎏金的银带把杯三件【图1】【图7】【图10】，在唐代以及波斯萨珊、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中多有发现。由于其突出的特点是杯的口沿至腹部带有





不同形制的把,故齐东方先生将其定名为“带把杯”。^[4]这类带把杯齐东方先生认为它们均不是中国传统器物造型,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有的可能直接为外国工匠制造,有的则是唐代对外来器物的仿制品。在讨论此类带把杯中所具有的西方因素时,过去一般将其与波斯萨珊系统的金银器相联系,后来日本学者桑山正进首次提出应考虑唐代金银带把杯与粟特器物的关系,并在其论文中列举出5例他认为可能属于粟特系统银器的带把杯的形状,^[5]前苏联学者马尔萨克(Boris Marshak)在其《粟特银器》一书所附的图表当中,将粟特银器分为A、B、C三个流派,这三个流派当中也均有带把杯。^[6]国外学者提出的这些观点后来也被中国学者逐渐接受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予以补充和发展。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三件带把杯的杯把上都带有横平而较为宽大的指垫,在杯的环形把上加上这样的指垫,既可以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度,这是粟特金银器中常见的做法。其中【图1】的这件带把杯的指垫上饰有一件浮雕的带翼奔兽,从其形象上看似为奔狮。应当指出,粟特人很重视这种装饰方法,在粟特人的带把杯指垫上常常饰有精美的花纹或人物头像,这种在指垫上饰以奔兽的做法虽然过去尚未见诸著录,但笔者认为可能是源自粟特风格。此外,这三件带把杯最突出的特点是器体浑圆而没有折棱,其中两件器腹均较低平,杯深小于口径,带有小圈足,杯体近似圜底碗形;另一件杯体为深腹直筒状。这两类型制的带把杯在唐、粟特系统中按照桑山正进、齐东方等学者的意见,其年代应当晚到八世纪中叶以后,^[7]这有助于我们推断这批器物的大致年代。

从装饰风格而言,【图1】的这件带把杯杯身呈圜底碗形,并且杯身做出以花瓣为托,上部再分花瓣的做法,这种式样明显具有粟特银器的特点。^[8]此器在杯内壁上用阴线刻出四组同向的鸟纹,每只鸟都脚踩在缠枝花纹之上,杯体底部有错金的同向鱼纹三条。这种在器物底部饰以怪鱼纹(也称为摩羯纹)的做法,也曾见于唐代喀喇沁旗摩羯葵花形银盘,^[9]这类纹饰正如齐东方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可能与印度文化的影响有关,但在中亚撒马尔罕的片治肯特粟特人遗址中,也有摩羯纹样出现,所以也不排除从中亚一带传入的可能性。^[10]此器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其杯身上饰有四组带翼神兽,这类带翼神兽的图像过去主要见于中亚、西亚一带,作为金银器上的装饰纹样也流行于波斯萨珊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上。【图10】这件圜底碗形的带把杯杯体上部饰联珠纹一周,腹部饰有宽松疏朗的缠枝纹,也是粟特银器常用的装饰手法。

但是,即使是在这三件带把杯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样式与风格,如【图7】为收藏于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内的一件直筒形的带把杯,它带有两个上下相互重叠的环形杯把,口部以下饰有联珠纹样一周,器腹部通体饰有莲花纹样,莲花图案之间饰有三立兽,一立兽头生两角,另两立兽头上无角。这种形制的带把杯在以往见诸著录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中还未曾见过,^[11]其系统和来源都需要作进一步的观察研究。笔者注意到,与【图7】同出的器物还有

[4]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6—50页,345—362页。

[5] [日] 桑山正进《一九五六年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とその编年》,《史林》60卷6号(1977),图7。

[6] 同注4,310页。

[7] 同上,346页。

[8] 同上,图3—40。

[9] 同上,图1—129。

[10] 同上,318—319页。

[11]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陕西:三秦出版社,1989年。



一件银瓶【图6】和一件银来通【图8】，均收藏于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它们无论是在器形、纹饰和制作工艺上都十分相似，表明其很可能为同时出土的一组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这件带把杯的底部篆刻有古藏文铭刻一行，其中元音字母“E”反写，为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字特点之一；文中的分隔标点符号也具有典型的古藏文特征。铭文内容已有国外学者作过的研究，译文大意为“具有崇高地位的汉地妻子私人收藏品”，故有学者据此认为其可能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请的汉地公主唐文成公主生前使用之物。^{〔12〕}对于这个意见，笔者认为显然应持慎重态度，因为即便是作为以“和亲”身份前往吐蕃的唐代宗室公主，除了唐文成公主之外，还有唐金城公主，两人在时代上相去近百年，况且对于这段铭文的理解和解释也还有各种可能性存在。但是，这件器物看来至少曾经流传吐蕃则是可能的，它被其吐蕃拥有者极其珍视，才会特意在上面篆刻以本民族文字以示标识。如果这个判断无误的话，对于我们由此推测其产地和来源应当有所帮助。

笔者在调查期间同时搜集到的国外研究资料表明，有关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组银器，国外学者曾进行过研究，有些意见是颇具有参考价值的。如瑞士学者阿米·海勒（Amy Heller）提出，在和早期吐蕃赞普有关的远古传说中，藏族先人皆为半人半鸟的异人，人首鸟身，指趾带蹼，乘带翼巨兽而行，而在这组银器当中的银来通【图8】上面恰好提供了这种异人异兽的具体图例，因此她认为这组器物具有吐蕃银器的特点。^{〔13〕}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的马莎·卡特博士认为，这组银器在卷蔓葡萄纹和卷叶纹内饰异兽、异禽以及着对襟衣的人首鸟身异人像，这个异人的服饰特点反映了同时期吐蕃服饰和头巾的式样，异人所著上衣上的小圆点状纹则是萨珊、粟特纹样及其衍生纹样中十分典型的团窠图案。^{〔14〕}阿米·海勒和俄国学者马尔萨克则进一步指出，这类衣饰“表现的是吐蕃人对当时粟特式长袍的了解”，并且认为这组银器上的图案应是吐蕃人制作的，但却体现出浓厚的粟特图案和冶金工艺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地唐朝纹饰的影响。^{〔15〕}

与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银瓶形制近似的还有私人收藏品当中的另一件银瓶【图2】，这件鎏金银瓶从工艺特点上看，远不如克里弗兰的这组银器的质地那样优良，银瓶胎体要轻薄许多，其纹饰特点具有相似性，如其中的翼马、翼龙和翼狮与克里弗兰银器上的有翼兽风格接近，银瓶上的三组两两交颈而立的立鸟纹饰更是多见于吐蕃时期的装饰性图案当中，并且影响到以后的藏族艺术。

综上所述，这批流散海外的金银器当中，可能既包含有唐、萨珊、粟特等不同系统金银器的因素在内，同时也很可能还包含有过去人们了解、认识不多的吐蕃独特的金银器制作技术与风格在内，应当如何来认识吐蕃金银器的特点与风格，为今后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从文献记载来看，吐蕃是当时中国甚至是中亚境内一个强大的集团，也是一个重要的黄

〔12〕 Bruce Christman, "Three Gilded Tibetan Vessels," in *Gilded Metals: History, Technology and Conservation*, edited by Terry Drayman-weisser,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2000, pp.169-185; Carter, Martha L., "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s Earliest Historical: a Preliminary Study," *Clevel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Vol. 3 (1998), pp.22-47.

〔13〕 Amy Heller, "The Silver Jug of the Lhasa Jokhang: Some Observations on silver objects and costum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7th-9th century)."

〔14〕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e Carter Martha L., "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s Earliest Historical: a Preliminary Study."

〔15〕 Amy Heller, "The Silver Jug of the Lhasa Jokhang: Some Observations on silver objects and costum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7th-9th century)."

金产出地。它在与唐王朝的交往当中,多以金银器作为礼物上贡。如唐贞观十四年(640)“吐蕃遣使献黄金千斤以求婚”;唐开元十七年(729),吐蕃赞普又向唐王朝赠送金胡瓶、金盘、金碗等金器;唐金城公主入藏“别进金鸭、盃、杂器等”;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16]如果没有自成体系的金银制作工业,我们很难想象吐蕃在与唐王朝的交往中能够如此便利地贡纳大量“形制奇异”的金器,所以从理论上讲吐蕃王朝应当具有制造高质量金银器的能力。至于具体的制作者,则不排除其可从唐、粟特等周边地区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它所需要的能工巧匠。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工匠们在其为吐蕃王室贵族们所制造的金银器中,完全有可能在吸收来自这些地区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同时形成吐蕃自身的风格特点。这批金银器的调查发现,为我们分析研究吐蕃金银器的特征提供了某种可能。

(二) 特色鲜明的织物纹饰

过去在国内发现的吐蕃时期的丝织品,很难有较为完整出土者。以近年来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的发掘为例,在迄今为止所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当中,绝大部分都是零碎的残片。^[17]但是流散于国外的这批吐蕃文物当中,却有保存状态相当完好的织物,令人叹为观止。

本文所涉及的几件织物均具有鲜明的纹饰特点,其中作为私人收藏品的一件小孩衣物【图14】和收藏于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内的小孩衣物【图15】织物上的图案纹饰几乎完全相同,突出的特点都是图案十分精美的联珠纹大团窠对鸟纹饰,口中含绶带,也有学者将其定名为“含绶鸟”。此外,另有一件私人收藏的马鞍装饰品上的织物,也是这种联珠含绶鸟纹织锦【图17】。

类似这样的织物纹饰过去曾在青海都兰吐蕃墓地中有过出土。如标本DXDN8: S2为一件红绫袍的衣缘,出土时被裁成长条,红色为地,以青、黄、绿等色显花,图案以花瓣组成团窠环,窠内为一对含绶鸟,颈部和腹上部饰以联珠纹条饰,尾羽分开上翘下钩,双足站立于棕榈基座上,宾花为对称的十字花。^[18]这件织物的基本构图与本文所述两件小孩衣物织物图案除团窠花环略有不同之外,团窠中的对鸟含绶母题是相同的,而且细部也很接近,如对鸟所含绶带下垂有三颗宝石,对鸟的颈部绕有联珠纹条饰等表现方法都是一致的。

青海都兰出土的这类含绶鸟织锦当中还有用联珠纹组成团窠的对鸟含绶纹,只是出土时均较残破,经过复原后可以看出其特点是均以联珠纹组成团窠环,如标本DRXM9: S20-2,织物以深红色为地,以藏青勾勒,黄、绿两色显花,从拼对后复原的图案上可以看到,联珠纹组成的团窠内为含绶对鸟纹,鸟头已残,但仍可见到其头后饰有绶带一根,鸟身羽毛用方形色块装饰,鸟口所衔绶带下垂处有三颗宝石,对鸟双足站立于棕榈树上。^[19]

除含绶对鸟纹之外,在联珠纹团窠中饰以其他对兽的母题在都兰吐蕃墓地中也很流行,如其中出土的一件联珠对马纹锦,以红色为地,以黑、灰绿、黄等地显花,在联珠团窠中饰有带翼的对马【图18】【图19】。类似这样的织锦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这批流散海外的吐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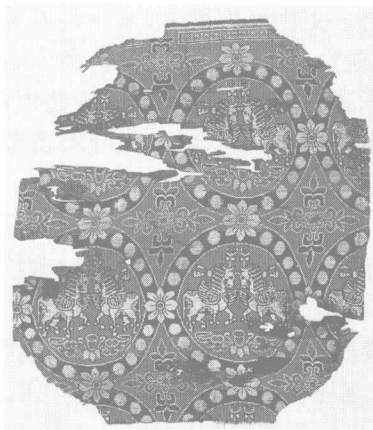
[16] 上述记载均见《旧唐书·吐蕃传》。

[17]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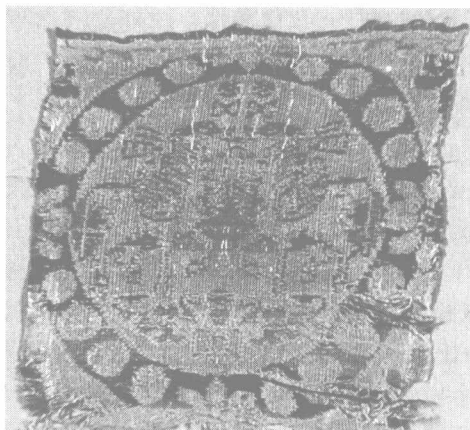
[18]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图一。

[19] 同上,图五:3。





【图18】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联珠对马纹织锦。作者提供。



【图19】青海都兰吐蕃墓地出土的对马纹锦。作者提供。

文物中另一件作为马鞍鞞装饰物上的联珠对狮纹织物【图16】，两者在装饰风格、构图母题等各方面都具有共性。

对于都兰吐蕃墓地中出土的这类联珠纹含绶鸟织锦，许新国先生明确指出其属于粟特系统，认为与其最为接近的图像见于中亚撒马尔罕地区七世纪中到八世纪初期的壁画，并将都兰含绶鸟织锦的年代必定在这一范围之内。^{〔20〕}姜伯勤先生也曾经研究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当中经常提及的所谓“番锦”一词，曾经也使用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未知是否可能指吐蕃锦、吐蕃人喜好之锦或沙州丝锦部落中由吐蕃人主持生产供吐蕃人用或用于外销的织锦”。同时他也根据青海都兰吐蕃墓地中出土联珠对兽纹织锦、伴出有藏文木牍等情况推测粟特锦可能曾经在吐蕃流传。^{〔21〕}

因此，联系到这样一些考古材料综合分析，可以初步认为本文所涉及的这几件以联珠对鸟纹、联珠对狮纹为特征的织锦，与青海都兰吐蕃墓葬所出织锦最为近似，应当是吐蕃人最为喜好的“番锦”之一种，有可能为粟特锦，也有可能为包含粟特锦、波斯锦等中亚风格在内的“胡锦”。唯有不同之处在于，迄今为止从我国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发现的唐、吐蕃时期织锦大多仅仅用于衣物的镶边，而很少看见用如此整块、大幅的织锦制作衣物或马鞍装饰品者。此次调查发现的流传海外的这几件完整的织物，堪称是劫后余生的罕世珍品，让我们能够一睹吐蕃王朝作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强大帝国当年的风采。

（三）关于出土地点的推测

最后，我们不能不涉及到的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是，这批流散于海外的吐蕃文物是何时、何地出土？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流失于海外的？虽然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经试图解释这些疑点，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不过，如果结合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的一些背景来加以考察，我们或许也能够从中寻出一些蛛丝马迹。

笔者曾经多年来在西藏地区开展考古工作，近年来在西藏虽然也曾经发掘出土过一些

〔20〕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219—220页。

〔21〕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208页。



吐蕃时期的墓葬,但大多墓葬在早年便遭到盗掘,出土文物极为稀少,几乎没有发现过金银制品和丝织品。^[22]在吐蕃发祥地的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境内近年来曾经先后发掘过两座小型的吐蕃时期墓葬,从墓葬中出土有用黄金制作的马形牌饰、圆形盔饰、筒形饰、耳饰以及铜马具、石串饰、贝饰等物。^[23]这是经过考古发掘清理的第一座出土吐蕃黄金制品的墓葬,但出土的都是小件器物,未见有大型金银器发现。

与西藏紧相毗邻的青海地区情况则大不相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都兰热水发现了一号吐蕃大墓。这座墓葬规模巨大,高30米,底部基座宽160米,被当地藏族群众称之为“九层妖楼”,在它的周围还散布着几十座大小不等的墓葬。经过对一号大墓上层封土的发掘,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丝绸、金银器、铜器、漆器、木器、古藏文简牍、装饰品等珍贵文物。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都兰县发掘清理的古墓葬已达近百座。^[24]近年来,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境内又相继发现了一批吐蕃墓葬,从中出土有彩绘木棺板画,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25]但一个严峻的事实也随之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上述墓葬中不断出土有珍贵文物,从而也引发了这一地区大规模的盗墓活动,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林梅村教授等人对都兰县公安局所作的调查记录,在二十世纪90年代,当地的盗墓活动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被盗出土文物中有铜马、银盘、酒具、丝绸等重要文物,而且大多通过北京、四川、青海、西藏等地走私出境。^[26]

在2001年下半年至2002年上半年,在青海省会西宁文物市场上陆续又出现了一批银器,共计35件,分为容器和动物造型的俑类,制作极为精美,后被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加以收藏。^[27]对于这批银器的真伪尽管还有不同的看法,但许新国先生认为其应系出土于都兰吐蕃墓葬当中的盗掘文物。其后,林梅村先生经过比对后进一步提出:“这批银器中的卧鹿以前在新疆米兰发现过,但误作为匈奴艺术品,看来,这类动物银器的年代实际上在吐蕃统治青藏高原时代。我们还注意到,这批银器中的银立鹿,几乎与近年在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银立鹿完全相同,属于国王一级的皇家艺术品。青海考古队发掘郭里木吐蕃墓葬的时间在2002年8月,而这批银器在西宁文物市场出现的时间是在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上半年,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这批具有皇家艺术风格的动物形银器未必出自都兰吐蕃大墓,更可能出自郭里木新发现的吐蕃墓。”^[28]这两位在中国边疆考古和西域史地研究中具有很高造诣的专家提出的意见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

[22]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6期。

[24]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编《七八一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25] 有关这批青海吐蕃墓葬的情况,可参见下列论著: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56—69页;《青海专辑·下辑》,《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收录的一组文章也介绍了青海吐蕃棺板画,即: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画卷》;林梅村《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亚洲新人文联网“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2006年6月;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68—82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2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附录五:调查记录,163—167页。

[27] 许新国《都兰出土动物银器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284—296页。

[28] 林梅村《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

